



## 当回“漆匠”

■ 安徽合肥 日月

前些日子，与几位坐在列车同一车厢一起去当兵的战友小聚。话题自然而然地围绕起当年穿上绿军装的难忘岁月展开了……“嗨！你小子刚当兵那阵子还挺有福气的，就当了几个月的油漆工，而我们几个呢，要么当兵3年当了3年泥瓦匠，要么烧了3年窑，要么种了3年庄稼。”“话可不能这样讲！咱们呀！个个都是一个人过了‘两个兵种’的瘾！”“啥两个兵种？”几个战友都用十分疑惑的目光紧紧地盯着我，问：“你们想呀！咱们是野战军吧？”“这话，还用说吗！”“这不就得了！那时咱们一边训练，一边修路、盖房子、烧窑，有的还一边开荒种田。这不就是‘基建工程兵’和‘装甲兵’（庄稼兵）吗！”“呵呵，秀才兵说出的话，就是中听。”我的话一出口，顿时引起战友们哄堂大笑。

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最后一年隆冬的一天，天刚刚亮，我们一批来自合肥东市区（现为瑶海区）的50名新战士戴着大红花，在一片锣鼓喧天声中，兴高采烈地登上一趟北上的绿皮列车。一到部队，我们被分别分配到3个新兵连。住的是简陋平房，睡在铺着厚厚稻草的地铺上，寒风从墙缝里刮进来，躺在被窝里也缩成一团。这还算好的，偶尔下雨，屋外下大雨，屋里下小雨，条件十分艰苦。好不容易等到新兵连下连，心想：这回条件一定会好起来吧！可谁曾想到老兵连队的条件，和新兵连差不多，只是可以睡上高低两层床。

那时计划经济刚转入市场经济，国家并不富足，部队决定自己动手，改善营区环境。号令一下达，部队上上下下坚持训练备战，一边坚持劳动生产。我们一起入伍的战友，有的随连队去了农场，当起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“装甲兵”；而更多的战友则是加入到营区基础设施建设行列。

那年月，无论是从事农业生产，还是从事基础设施建设，机械设备都十分匮乏。耕地种田，维修道路，建筑盖房，哪一桩活，都全靠我们一双双勤劳的手。我所在的三炮连担负建造楼房的任务，工地远离军营，在闹市区的淮海路上，每天一出完早操，草草地吃上几口饭，就得乘车赶往工地。一到工地上，不论是穿四个兜的连排长，还是只穿两个兜的普通士兵，官兵都是一个样。重活、脏活、累活一样上。指导员是位高干子弟，父母都是老红军。据老兵们说，指导员的父亲和岳父，均是兄弟部队的副军级领导干部。他是一个标标准准的“红二代”，地地道道的“官二代”。可从指导员身上，一点点都看不出。他除了平时穿着四个兜的干部服，但演兵场上摸爬滚打，样样不比普通士兵差；干起活来，和普通士兵没两样。当泥瓦匠，墙砌得笔直笔直的。那一手绝活，一点不比四五级瓦工逊色……。

我在基建大军中，只是充当漆匠一个小角色，天天拎着油漆桶爬上高低，用沾满油漆的小刷子，一点点地漆着门窗。有时油漆活干完了，还得去弯腰蹶屁股地挥舞着大铁锹，一锹一锹地搅拌着水泥砂浆，当起小工……官兵们人人都是手磨出一个个血泡，磨出一层层老茧，磨掉一层层皮，但从没有一个叫疼、叫苦、叫累的。

战友们在一起忆往事，岁月难忘，兴奋不已。有的说：“要不是当年在部队磨砺出这身不畏艰难困苦、敢打敢拼的钢铁意志，我下岗后又怎能艰苦创业闯出一番新天地！”也有的说：“当年要不是当了一回‘装甲兵’，我怎么敢到农村承包土地，成了养殖大户呢！”还有的说：“部队把我们锻造进军地建设的两用人才。”我也很自豪，毕竟在我25年的军旅生涯中，也曾有过当回“漆匠”的别样经历。凡经历，都是经验的积累！

## 人在楼中

■ 安徽合肥 程耀恺

汤庄外公家有一座两层高的土楼子，与草堂连为一体，两丈见方，土墙草顶，实木楼板，窗户很小，枪眼不少。这是皖西一带多数农户必备的，在兵荒马乱的年代，那是一家老少的安危所系，面对悍匪、残兵，它显示出一种威严。大户人家的土楼，多用砖石筑就，木梁瓦顶，形制与品类相对丰富些，雕楼立于庄园的四角，里一层有所谓的绣楼与翠楼，像是特意家族中女性所建，好让她们春日凝妆登高远望——西风催世换，沧海变桑田，这些乡村中的土楼的价值与诗意，沉吟间，花谢花飞。

大约上个世纪之初，世代农耕的人们，陆续离别草堂与土楼，拖家带眷，从遥远的村镇，从偏僻的山乡，往他们并不熟悉的城市里流淌。城市匆匆忙忙以楼房为容器，把人们归于不同的档，乱点鸳鸯谱想来在所难免。那些被高楼收容的人，开始了什么样的新生活？

城市在不停地吸纳人流的过程中，最终形成一个个城、楼、人的共生圈。人在楼中，楼在城中，城在人中。城、楼、人，环环相扣，盘根错节。在这个共生圈里，楼，既是我们的天堂，容我们春风得意、欢天喜地；楼，也是我们的困境，令我们伤时感世、悲从中来。

城市无法一面对它的居民与游客，城市通过楼房与人类发生关联。楼，对于勤劳功烈的人来说，如一座蜂巢；对于深居简出的人，像一只蚕茧；对于谨小慎微的人，是一条鼠笼……城市的含义，由无数高楼大厦组合而成。城市以楼为载体，接纳一切、包容一切、创造一切，与此同时，城市也以楼为中介，过滤一切、消解一切，乃至吞噬一切，其中包括我们的激情与欲望。

从城市诞生之日起，楼就成了城市和城市生存

的一种隐喻。托夫勒在《第三次浪潮》中如此描述当下和未来的城市生活：“家家户户都同时起床，同时吃饭、乘车、劳动，同时回家、上床睡觉，甚至做爱也大致在同一时间里。”城市的步调，生活的节奏，全凭一幢又一幢楼宇的存在，人们才得以有滋有味地忙着，无可奈何地活着。这时候，楼与秩序联系在一起了，作为城市硬件，楼，规定、制约、调节这个城市里方方面面的秩序：物的秩序，力的秩序和人的秩序。又因为秩序的发生与发展，各种各样的楼房得以拔地而起。

细细想来，再好的楼，也只是一个空壳，而不是家。家，是房子+岁月+生命；楼房千篇一律或大同小异，家却多姿多彩千变万化。有家，才有故事发生。比如我的楼上，原本住着一家子，迁入新居，房子空了下来。没多久，先后有人打听租价。房客搬进来，一天，小孩子在楼道里摔了一跤。于是传来骂声：什么鬼地方呀，连盏路灯都没有！骂了，事情就此了结？不，随时都会重演。作为常住户，我只能静观其变。我的印象是：整个楼洞，没有人不关心孩子的摔跤问题，却没有一个人关心摔跤的原因，至于有没有人动手排除让孩子摔跤的根源，我不敢妄断，想必会有——我在笔记本上记下所见、所感、所思，恰好一位教哲学的朋友来聊天，他一看，心血来潮，大叫：好啊，一个涵盖了人与楼的哲学命题获得了完整性：时间、空间、事件、概念，一应俱全。我在一家应用科研机构谋生，对哲学似懂非懂，然而我知道，日月如梭，潮起潮落，楼越盖越高，故事却越演越单调。

人在楼中，一如鸟在树上。节节升高的树枝上，布满了大小不一的鸟巢，那是我们的家。我们的家，就挂在这种叫“楼”的大树上。

## 又想起严先生

■ 安徽合肥 莫欣

10月4日傍晚，严云绶先生从住了两个多月的医院回到书香苑的家里，据说下车往家走时还笑着挥手与迎面而来的邻居打招呼。我思忖着第二天再去探望也不迟。谁知第二天一早就接到师母曹老师的电话，赶到时得知严先生已在睡梦中逝去。曹老师悲戚地说，他个人的心愿总算达到了，这是他自己的选择，从家里，在亲人的怀抱里安然地走。

严先生近两年被病患反复折磨，却又平生最不愿看医生吃药，更遑论去住院了，翻看他的保健处方本，还是原装的，基本没有用过。但在今年七月份，肾病严重起来，两腿浮肿，吃不下饭，在医生的严辞和家人的劝说下才勉强住进医院，一去就进了ICU危重病房。两个女儿闻讯从广州赶回来，却因疫情封闭，父女连面也见不到。后期，他每隔一天，就被护士送去做一次大透析，一次5个小时的煎熬，家属只能在护士推送病床经过处，远远瞅他一眼，无言地招招手。

严先生痛苦至极，在电话里告诉家人，身上插满了管子，动弹不得，要是有治好病的一丝希望那也值了，现在这样无限期地延续着自己和全家的痛苦，痛不欲生。这一天终于到了忍不下去的地步，严先生不管不顾拔掉身上的管子，药也不吃，拒绝继续治疗，坚决要求回家。不得已，医生只好让他带了药出院。家人以为让他回来享受家庭的天伦之乐，或许有利于他的恢复，却万万没想到他这么快就走了。

严云绶是我在安师大读书时的老师。虽不同系，但我在校时，就曾闻说中文系有个青年教师，操一口桐城口音，课讲得精彩，学问做得好。后来又听说他被公认教学科研水平高，先被评为副教授，后又被评为教授，终身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。学校提拔他为科研处长，后又毫无悬念地担任了副校长。这之后一段时间，却又突然听说他辞去副校长一职，专职担任学校一个研究所所长，从事文学研究了。

严云绶是位无党派人士，生性恬静寡欲，待人宽厚。他刚到省出版局任职不久，一个年轻编辑跟着他去黄山开会，帮他拎着随身带的包，到天晚气温降下来了，严局长找衣服穿，那位小伙子却不知把包丢在什么地方了。第一次陪新来的局长出差，就闯了祸，年轻人十分自责，严局长没有半点不快，却反过来安慰他说，包里没什么要紧东西，丢就丢了，不要放在心上。这位编辑后来也成长为出版集团副总，他说严先生在这件事上的宽容大度深深影响了他以后的待人处事。

严先生对待业务工作认真负责，个人名利方面则淡泊处之。记得我到局里工作不久，1997年他就转到省政府参事室工作。在那里他继续关心出版工作，还兼带两个研究生。大约在2002年，他在参事室工作刚过五年，上面来文要局里给他办理退休，而以前像他这样的党外专家一般要干满十年。但那时正在机构改革，可能有了新的政策。局里人事部门也向上作了反映。但他接到通知后泰然处之，依旧兢兢业业继续带他的研究生，完成他承担的五八五规划科研项目。

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，严先生的告别仪式上，想到从此之后再也不会见到尊敬的严先生，再也听不到他对我家楼顶菜园的蔬菜是绿色生态食品的称赞，再也不能读到他转发给我的微信帖子了，就陡然悲凉。但一转念，想到严先生去了天堂，从此没有了病痛，便又从心底生发出一丝暖意来。